

## 国家认同、国际意识与未来中国的发展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朱 锋

(发表于《当代中国与世界》学术季刊 2006 年第一期)

进入新世纪才短短的 5 年, 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周期的起点阶段。从经济发展来看, 在经历了 78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持续 27 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资源的瓶颈、技术的瓶颈、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瓶颈、国内住房等大宗消费品的瓶颈以及国际市场准入的瓶颈都相继出现, 金融机构的改制也进入了关键阶段。显然, 未来 3-5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将预示着未来能否在 20-30 年时间内中国经济仍然保持强劲增长石头的关键。然而, 要解决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 那就是中国人的国家认同与国际意识的进一步提高与完善的问题。中国目前的发展是在全球化环境下的发展, 中国今天的崛起, 是在世界体系内中国走向与其他大国新的权力分配关系进程中的崛起。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 教授在总结大国的兴衰规律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大国错误的国内政策可能遭受挫折; 大国错误的国际政策则不仅可能直接导致国内的受挫, 最重要的是, 可能直接导致国家发展的整体失败”。<sup>1</sup>原因很简单, 任何一个大国如果眼睛不紧紧盯着各国间的合作与竞争, 不在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复杂环境下谋求趋利避害、生存和发展, 单纯国内系统中纵向的时间轴上的比较或者来追寻自己的崛起是不完整的、甚至有问题的崛起。

什么是“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国家所属国民对公共形态上的制度和法律权威的效忠。具体来说, 就是效忠于政府、政党、宪法、法制、经济生活以及产生这些公共权威的国民。“国家认同”可以表现为三个不同的层次: 一是对国家公共权力的接受和尊重; 二是对国家地域范围内共同经济运作形态和经济活动的接受与服从; 三是对形成一个国家的公共权力与公共权威密切相关的历史、传统、文化、价值以及民族特性的尊敬与忠诚。在现代民族国家系统中, 塑造和维系国家认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民族主义。因为现代国家都是以同一民族人群为基础的“政治—文化—经济共同体”中发展起来的政治与社会单位。没有强烈的民族认同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sup>2</sup>而国家认同又在相当程度上在现有民族国家内部取代、并超越了民族认同。在当代国际关系中, 任何民族认同的最高归宿, 都是建立起符合民族利益、并能最终有效保护民族利益的国家机构以承担和履行国家主权。

国家认同首先要求民族认同, 并不等于就是单一民族至上主义或者单一民族认同。由于历史、传统、权力范围等实际因素的作用, 在当代世界政治中, 多民族融和的民族认同、并进而产生和发展出统一的国家认同的事例比比皆是。例如,

<sup>1</sup>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 23.

<sup>2</sup> 在英文中, “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同一个单词: NATIONAL IDENTITY。这是因为在过去四百年的人类历史上, 但凡发展出强烈民族认同的意识和能力, 但最终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在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上, 民族认同绝大多数都已上升为了国家认同。具体的历史过程, 请参见 E.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中国有 56 个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是建立当代中国国家权力和国家效忠的重要基石。美国完全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人的民族来源上纷繁复杂，然而，美国法律规定但凡美国人都必须效忠美利坚合众国。新加坡也是个多宗族的国家，但新加坡的国家认同也绝对要求超越简单的各个种族的特点。

国家认同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增强国民的心理感受，同时，更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动员能力来充实和营造认同的基本内涵。例如，各种国际体育比赛中的升国旗、奏国歌，爱国主义教育，甚至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除夕春节联欢晚会，都是不断丰富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当然，民族主义是培养和发展国家认同的最有效的手段，因为它是培养国民文化、政治、法律和社会归属感的最好途径。

民族主义是西方近现代国际关系的产物，其根源是 1648 年威斯特法里亚和约之后形成的近代欧洲政治体系，是欧美各国国家为了赢得和保障国家主权、巩固属地治权而发展起来的政治思潮。正如沃勒斯坦所指出的，民族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在世界系统中增强拥有权力的国家实体，也是凝聚抗拒世界体系的各种力量的工具。”<sup>3</sup> 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中，民族主义的形态、特质、内涵和目标可以说千变万化。强调民族主义自决和各个民族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这是二战以后在冲击和瓦解世界殖民体系的过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提出的正义口号，50-70 年代的民族主义就是以这种促进民族觉醒、摆脱殖民统治和建设独立国家为核心要义；90 年代以后，反殖、反霸为特征的民族主义在全球退潮。当代世界政治中的民族主义可以根据其诉求的政治目的和所采用的方式而大致分为经济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国人没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从近现代围绕着国家主权而建立的西方民族国家的标准来看，历史上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外争主权的“民族国家”，不如说中国更象一种“文明”。<sup>4</sup>这个文明中虽然自古有“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但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并没有完整的、准确的国际观，因为中国太强大，以至于我们所认识的非中国的世界都是“化外”的“蛮夷”之地。即便我们一再遭受外敌入侵，但也只是中国史书上所记载的那样，是一种“五胡乱中华”的状态，而不是切实感受到的是在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国家间的竞争与冲突。鸦片战争让中国开始睁开双眼看世界，也使我们被强迫性地拉入了近代世界体系。民族主义成为中国国家意识觉醒和发展的锐利的思想武器。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的成立，民族主义一直都是中国人寻求富强、平糜内战的历史性动力。因为我们真正意识到，中国的最大威胁是“列强环视”的威胁，这是一场民族间的生死竞争。

70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国求富强、求复兴的伟大壮举，是牢记“落后就会挨打”的历史教训之后要走向世界的艰苦旅程。民族主义的强大召唤一直是激励中国人蓬勃的精神力量。从 1980 年北京大学在中国女排首度赢得世界女排锦标赛之后喊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到 2000 年申奥所提出的“给中国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惊喜”的主题，中国人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有着如此清晰、强烈而又朴实的民族主义意识。然而，我们的民族主义一直就从来没有断过危机，一直也从来没有过一个统一、完成和坚定的理论内核。

和“五四运动”相联系的，是我们的新文化运动，这为中国全面接受现代西方文明开辟了道路。但新文化运动中要“砸烂孔家店”的豪迈，表现的是在中国

---

<sup>3</sup> Immanuel Wallerstein,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41.

<sup>4</sup> Lucian W. Pye, "Erratic State, Frustrated Society," *Foreign Affairs*, Vol. 69, No. 4 (Autumn 1990), p.54.

进入现代“西潮”的同时对我们自身传统文化是否还构成一种“发达文明”的深深的怀疑。结论当然是简单的，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在中、西文化的“文明”划界上要远远高明于当年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也是对全盘西化论的超越。但 1966 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主席他老人家自己背弃了自己当年提出的方针，在“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口号下中国被彻底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这使 21 世纪中国文化认同危机灾难性地达到了高潮。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开始拨乱反正。但文化认同的危机始终没有解决。从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到批评“异化”，从“黄土文化”到“海洋文化”，从“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到“新左派”，文化认同危机时常还在惊扰着中国人的强国梦。在文化认同危机还时隐时现的同时，权威认同危机、价值危机也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而出现了。有关中国目前“价值断层”文化哀叹还少吗？在改革开放 27 年之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达到了中国历史上新的高度，但其他形式的认同危机并没有彻底解决过。

我本人从来不怀疑中国目前民族主义思潮的爱国主义内核，也从来不认为在民族主义情感的驱动下、即便出现的一些情绪化的举动就应该为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喊停”，我也从来不认为中国眼下的民族主义是我们必须忧虑的“敌人”。但我们必须忧虑我们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如果我们的民族主义削弱了我们的国家认同，我们就必须好好的清点和检讨我们的民族主义。否则，在“爱国”前提下的不经思考和光顾个人感情宣泄的民族主义就会“误国”。当年义和团运动的义士们哪个不爱国，提倡全盘西化的又哪个不爱国？“爱国”似乎是中国人天生的宿命，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却也是中国人的忧思。

每一种民族主义都有自己的特点。美国的民族主义是“君临天下、当仁不让”的自信。<sup>5</sup>所以，布什政府采取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战略还是提出要结束全世界的暴政是美国外交的最终使命，都是经典的美国式民族主义。“布什主义”的核心就是这种美国式的、近乎基督徒要带领世界走向新的伊塞亚之地的民族主义。英国的民族主义就弱吗？1982 年撒切尔夫人发动的马岛战争，即便是巴掌大的底盘英国也不惜出动远征军。但今天英国的民族主义，更多的是让英镑继续“游离”在欧元区之外，让英国人能在遭受“77 伦敦爆炸案”后继续享受莎士比亚的戏剧，继续周末在各种吧里喝点小酒。昔日“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早已成为往事，英国人没有了激情要在世界的权力争霸赛上重新崛起。但今天英国人享有的平静、适意的后工业化时代生活任何人也别想夺走，这就是英国的民族主义。伦敦爆炸事件之后，笔者 2005 年夏天在英国游学月余，对英国人处理国际事务的老倒、历练以及无欲争强、只求英国化生活时代永继的民族情怀，真的是回味无穷。

中国的民族主义当然应该有我们自己的特点。我们现在的问题恰恰是中国人的特点太突出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分析得很透彻。有人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言语上是进攻性的，但在本质上是防守性的”。<sup>6</sup>你不要管中国人怎么“骂”得厉害，但具体行动上大多数的时候还是该干吗干吗。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防御性”的，因为中国今天正统的意识形态已经弱化，民族主义是保持中国人价值共识与社会凝聚力的工具，而不是一种左右中国国际行动的极端思潮；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本质就是要为自己过去历史上所

<sup>5</sup> Andrew J. Nathan and Robert S.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New York: Norton, 1997, p. 32.

<sup>6</sup>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Lucian W. Pye, "How China's Nationalism Was Shanghaied,"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January 1993, pp. 107-133.

受的屈辱和侵略而“讨还公道”，就是在再度在世界面前“证明自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又是具有“进攻性”的。<sup>7</sup>

虽然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没有自由主义的传统，也匮乏个人权利要素，但毕竟这种强烈的情感和意识是中国人迫切希望了解世界的重要动力。西方人质疑这样的民族主义究竟能给中国带来什么的好处，认为缺乏自由主义要素的民族主义思潮具有很强的破坏力。<sup>8</sup>然而，中国人自身的自省意识和国家层面的理性决策，是能够纠正单纯情绪化的民族主义的破坏力。问题是，什么是中国人的个体在强大的社会性民族主义思潮中的自我期许和自我选择？

什么是国际意识？

传统意义上来说，国际意识就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和自身关系的系统的理念和方法，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正确地在国际系统中客观、准确、合理地定位自己、看待别人、并设定自己的目标与通往目标的道路的系统认识。国际意识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认知世界的意象（world imagery）、了解他国的知觉（foreign perception）以及自我的期许（self-expectation）。

中国的国际意识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常常是反应性的、被动的和简单化的。近现代意义上的“世界”的概念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西方化”的产物，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历尽磨难和屈辱被迫适应现代化的潮流而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比如，在中国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华夷之辩”一直主导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的“世界化”是一个合而为一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在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的文明观念溃塌之后被迫接受和发展起来的。其中，如何认识世界和确立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意识一直是中国近代化里程中充满矛盾和挣扎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国际意识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非常的理想化，于是就有了“一边道”、“阵营选择”等必然的断裂性的国际意识选择。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重新走进国际社会，但什么是我们面临的世界，什么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什么是在我们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去积极经营的国际环境？其实，这些问题始终都没有真正解决过。由于受西方的欺负与侵略，我们对于实力不对等地位下的“不安全”感有着切肤之痛。所以，争取强大成为我们的中心目标；但国际关系中强者如林，而且别的国家对你的发展总是心有戒心，常常明里和暗里制肘、甚至防范和遏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挫折感和期盼国家强大的看法总是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历史和现实所遭受的不满，又让我们很容易有简单化的“两分法”来看问题，对世界的归类也常常容易不是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是“敌人”的所作所为，就必然是“封锁”、“包围”和“遏止”中国，就必然是“军国主义复活”，也必然就是一切在和与中国过不去；而被列为“朋友”阵营中的国家，由于期望太高、失望也高，所以总不免骂骂咧咧，甚至动不动给有的国家戴上这样或者那样的帽子。例如，中俄在远东石油管线问题上的争论，让很多年轻朋友对普京是不是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非常疑虑。2005年8月中俄的联合军演又让很多的网友又似乎很快忘点了中俄在远东石油管线上的争论，又“一

<sup>7</sup> Allen S. Whit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China Quarterly*, June 1995, pp. 295-316; “Assertive Nationalism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sian Survey*, August 1993, pp. 913-933.

<sup>8</sup> Suzanne Ogden,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Precedence of Community and Identity over Individual Rights,” in Alvin Y. So, ed., *China’s Developmental Miracle: Origins, Transformations, and Challenges*, Armonk: M. E. Sharpe, 2003, pp. 224-245.

边倒”地开始看好中俄关系。中国人的“国际意识”和“民族主义”绝对是一对“孪生兄弟”，彼此不仅“血脉相联”、而且“肌肤相亲”，相互提携、相互作用。但结果是，中国人似乎始终缺乏统一的、自信的、能够对自身的发展和世界的现实建立起具有解释力和包容力的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哲学认识，中国人的国际意识也就必然常常随着不同的事件而上下沉浮、缺乏相应的成熟和连续性。

什么是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如果要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的话，那么，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对中国而言就是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利益共同体，是机遇与挑战同在的客观现实。其对中国的意义不仅存在着巨大的压力、敌意和风险，最重要的，世界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利益实现的必然场所。今天中国的外交战略还是国际意识，说到底不仅取决于我们对世界的战略认识的高度，更取决于我们自身利益的实现方式。当世界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必然延伸，当世界的资源分配和获取方式觉得了中国未来“世界工厂”的持续，当“世界”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活动都和整个世界有着更密切关联的时候，中国人国际意识的成熟在相当程度上又将决定中国人自身利益实现方式的成熟程度。

7月下旬我在英国杜兰大学当访问学者时，住在一个叫“城堡风景”的乡村式的旅店里。这是英国典型低档旅店通行的“B&B”经营方式的旅店，就是管床（bed）和管早饭（breakfast）。给我做早饭的是一位50开外的英国妇女。有一天我和她闲聊说起中国南京汽车工业公司兼并了英国的“ROVE”老牌汽车公司。这位老太太听了，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有把我噎着。她说，“钱真的是很管用啊”。从她这句话我听出了两个意思，一个是中国人开始有钱了；二是只要有了钱，中国人——英国人心目中东方的落后国家，当然也可以到英国来兼并英国公司了。她的这句话让我当时很是不舒服。但回过头来，我却想明白了。钱、或者和钱一样的某些物质力量，只要你有了优势，那种意像（image）、知觉（perception）、以及交往方式（dealings）都是可以改变的。

从这个例子来说，中国人受不受世界各国的尊重，能否在世界和平崛起还是非和平崛起，关键是你手中有多少“筹码”以及你有使用这些“筹码”的意志与能力；同时，关键也是我们中国人能够以一种什么样的哲学与思想去认识和把握我们和世界正在变化了的关系。单纯的“实力”信条不能解决中国目前和今后在与世界复杂多边的互动中所面临的各种关系。一个崛起的、日益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中国人培植和发展一种更能使得我们和世界良好地处理关系的国际意识。例如，从小到中国人在海外所表现出的行为举止和文明礼貌，中到在日常活动中的诚信意识，大到中国在外交活动中的“规则意识”和处理好“有所作为”与“韬光养晦”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国际意识不需要沉湎在我们充满悲情的民族主义激情与自恋之中。“痛诉革命家史”只能说给自己人听。当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苦难历史的追忆中得到共鸣、得到满足、甚至得到动力的时候，我们的对手、我们的合作与竞争的伙伴是不会听你“通诉”的。尽管你有千般悲情，那是你的事。别人眼中只看你手上是否有足够多的“筹码”以及你使用这些“筹码”的方式，还有，那就是手握“筹码”的人，本身是否能体现出让对手尊敬的语言和举止。

坚持民族主义、提升国际意识、走向崛起的中国

中国所处的东亚是后冷战时代民族主义的一个“例外”。当其他工业化国家都处于民族主义低潮时，东亚却正处于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日本目前美化侵略

历史、拒绝与亚洲邻国缩小历史认识分歧的顽固做法的背后，是日本自 90 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人有人片面地担心中国人自身的民族主义，忽视东亚民族主义整体演变的轨迹，甚至盲目地批评中国的民族主义，这本身是对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历史与现实、对东亚政治的历史与现实缺乏认识的结果。迄今为止，中国的民族主义都只体现出了“防御性”、而不是“进攻性”的特点。特别是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显示出了对“进攻性”民族主义高度的警觉与防范能力。除非中国未来国内局势失控，民族主义并非是中国国际意识和对外政策最需要警惕的对象。但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的是，一个民族的国际意识应该主导民族主义，而不是让民族主义去颠覆自己的国际意识。这是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每个国家应该具有的国际观的起码条件。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最担心的是中国国内局势的失控有可能导致中国转向极端的民族主义，<sup>9</sup>为了抵御这个意义上产生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更应该用健康和成熟的国际意识去改造和丰富中国的民族主义。

增强国家认同，除了依靠爱国主义教育等国家动员手段之外，培养和发展国民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参与是非常重要的途径。提高政治和社会参与的基本方法当然有多种多样，但是充分让人民享有各种自由权利、增加媒体透明度和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机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手段。西方国家常常通过投票等竞选的方式来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这本身就是西方政治中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sup>10</sup>这种“大民主”的方式或许在中国还不成熟，但至少不断深化中国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中国民对参与公共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程度，建立其相应的制度发展这种公民参与，从目前来说是加强国家认同不可或缺的内涵。目前互联网为什么成为言论发表和个体参与最活跃的领域，就是在现行体制下网络为中国人政治和社会意志的自由表达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平台。但由于互联网上的公民参与多是在“网民”层次上进行的，缺乏必要的引导和体制上的重视，因此，网上讨论成为了可以随意宣泄意见、表达不满的渠道

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互联网对中国目前缺乏公共参与的政府机制所起到的调和与补充功能。网络平台在今天的中国起到了相当程度的增加国家认同的作用。网上讨论的最为热烈的两个话题——中日关系问题和台湾问题，广大网民表达了充分的对这些国家公共话题的参与意识以及激昂的爱国主义热情。虽然互联网传达的声音有时在整体上过于偏激，但至少反映了中国现有体制水平上的高涨的民族主义意识。我们既要看到这些意识有时所有的极端一面，但也必须看到这些意识对国家认同的强化作用。一味将网络民族主义定位为狭隘、偏激的看法，不仅过于挑剔，事实上对今天 IT 时代中国民族主义情感的朴实缺乏尊重和了解，更是对于今天国家认同需要进一步输理与引导欠缺严肃的态度。

加强国家认同、提升国际意识，中国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促进国家整体发展，二是必须增强中国与世界交往过程中的理论与知识创新。国家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必须包括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等多层次的内容。从社会发展来看，党中央所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深入人心，也是经济发展能否保持与社会发展同步进行的重要指标。问题是“和谐社会”如何建立，具体的措施如何到位，是未来中国面临的重大考验。从政治发展来说，进一步地加强

---

<sup>9</sup> Michael Yahuda,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Asia-Pacific*, Second an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305-310; Edward Freidman and Barrett L. McCormick, eds., *What if China Doesn't Democratize? Implications for War and Peace*, Armonk: M. E. Sharpe, 2000; Ezra Vogel, ed., *Living with China*, New York: N. N. Norton, 1997.

<sup>10</sup> Joshua S. Gold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urth Ed., New York: Longman, 2001, p. 34.

执政党能力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进展，事关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国家实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能力。面对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压力，中国政治发展必须解决的任务是巩固和加强高效、法制和精英主导的政府体制。现代化理论早就证明，后发国家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要取决于政府的“管理”（governance）才能。而现代国家的“管理能力”，一是要靠不断稳定和成熟的制度建设，二是要靠不断壮大和活跃的精英队伍建设，三是要靠国家在市民社会中强大的动员机制建设。笔者所做的众多问卷调查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影响中国人国际意识和国家认同目前最大的因素是地域、阶层的发展不平衡以及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中国体现在各个层面上的发展和利益分配的日益突出的非均衡性，是阻挠中国人加强国家认同和提升国际意识发展的重要阻力。例如，越是收入低的阶层，其国际意识的抗争性和对立性越强，越是内地欠发展地区，对解决国际事务时所采取的政策建议就越强硬。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鼓吹和宣传在外交政策上的强硬立场，成为了社会边缘群体发泄对社会不满的重要渠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民族主义的不确定性目前阶段首先取决于中国国内利益分配体制上的不健全性。

党中央目前所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已经为中国未来的健康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但“和谐发展”并非短期内就可以一蹶而就的目标。为此，用科学的观念、理论和知识引导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和国际意识是一项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这种艰巨性不仅在于我们需要按照今天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展示出的新水平和新特点来完成“世界”认识在中国社会文化中新的“内化”，从而摆脱从鸦片战争以来“世界”是一个强迫中国人接受的无奈现实的窘境，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按照中国今天已经清晰了的利益实现方式来重新塑造我们与“世界”关系的新的认识，并超越“历史悲情”完成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新界定。例如，中国已经不再单纯是世界秩序被动的接受者，我们已经成为新的世界秩序发展的重要参与者。什么样的世界秩序是我们所需要的？至少，从中国今天的发展需要来看，我们的外交工作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已经从 80 年代初的“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扩大到了我们需要争取和建设“一个合作、善意的国际市场”和一个“可靠、安全的资源来源”。不解决市场和资源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是有限的；而解决市场和资源的方法，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曾有过战争、军事冒险和国家主义的极端化等各种选择。但今天，在一个新的国际时代，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和追求自身利益的方式，如何能走出历史的窠臼坚持和平主义的发展道路，就需要我们在“国家认同”和“国际意识”这两个方面都建立和建设新思路、新眼光，并进而能寻找到新途径。

在现实的国家利益发展面前，中国强化和发展“国家认同”与“国际意识”的进程必须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它应该是中国追求“现代性”努力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认同与国际意识的现代化其实一直是中国人现代化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sup>11</sup> 在今天中国对外和对内发展的关键时刻，这种努力格外重要了。

---

<sup>11</sup>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2<sup>nd</sup>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p. 154.